



陳芳明作品集【文史卷】

26

後殖民 台灣

24

POSTCOLONIAL TAIWAN

ESSAYS ON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BEYOND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陳芳明

22

FANG-MING CHEN

戰後台灣文學史的發展，較諸日據時期還要複雜。
 這牽涉到戒嚴文化下所產生的族群與性別問題，
 也牽涉到外來強勢文化的干涉，如現代主義與張愛玲文學的議題。
 在本土論述日益趨於鞏固之際，文學史家如何重新評價這些猶待釐清的問題，
 正是本書的重要關切之一。

本書從後殖民立場出發，探討解嚴後台灣社會的性質究竟屬於後殖民或後現代，
 從而進一步觀察文學史書寫所面臨的關鍵思考。
 書中以葉石濤的文學史工程為例，追溯他的左翼史觀及其文化意義。
 對於頗具爭議的張愛玲文學，本書企圖釐清歷史遺留下來的癥結，
 並且為張愛玲在台灣文學史中尋找一個恰當位置。

24

作者提出後殖民立場與後結構的思考，來觀察戰後台灣文學多元而複雜的豐碩內容。
 其中對於解嚴後的女性書寫，尤為關注。
 書中並收入作者與陳映真的論戰文字，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與歷史解釋，
 頗多值得矚目的突破性見解。



ISBN978-986-120-615-8

RL9804X NT\$340 HK\$113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9 789861 206158

00340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陳芳明著．--
三版．--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1.02
面：公分．--（陳芳明作品集；4）
ISBN 978-986-120-615-8（平裝）

1. 臺灣文學史

863.09

100001778

陳芳明作品集【文史卷】4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Postcolonial Taiwan: Essays on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Beyond

作者 陳芳明

責任編輯 林淑萍

封面設計 王志弘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02-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30~12:00；下午 13:30~17:00

24 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 02-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電郵：hkcity@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2 年 4 月 1 日

二版一刷 2007 年 6 月 1 日

三版一刷 2011 年 2 月 17 日

ISBN：978-986-120-615-8

售價：340 元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POSTCOLONIAL TAIWAN

ESSAYS ON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BEYOND

FANG-MING CHEN

後殖民台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陳芳明

後殖民台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目錄

自序：我的後殖民立場

9

第一輯 戰後文學史論

後現代或後殖民

23

——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

47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

69

歷史的歧見與回歸的歧路

91

——鄉土文學的意義與反思

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

109

——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一九八七—一九九七）

挑戰大敘述

131

——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

女性自傳文學的重建與再現

151

台灣現代文學與五〇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

173

——以《文學雜誌》為中心

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精神

197

——從《在冷戰的年代》到《與永恆拔河》

永恆的鄉愁

219

——楊牧文學的花蓮情結

第二輯 史觀的討論

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

243

——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

261

——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

287

——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紀念吾友

吳潛誠教授，以及
他的果敢與憂悵

自序：我的後殖民立場

初識後殖民理論，是在一九八九年左右，一個值得深思的年代。當時我的左翼文學研究已經持續一段時期，而《謝雪紅評傳》的撰寫也接近完成階段。自己的左翼思考日趨穩定之際，我的心情卻頗不平靜。

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蘇東波」浪潮，使我目睹到社會主義政權的次第崩解。我第一次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之間誠然存在著巨大落差，從而也開始質疑左派的終極理想是否屬於烏托邦。就在陷於困惑情緒的深處時，中國發生了血腥屠殺的天安門事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終於暴露它虛構、虛偽、虛矯的身段。我不能不表達對中國共產黨最嚴厲的批判，而這樣的批判都寫進了《謝雪紅評傳》的最後幾章。

我之接觸薩依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便是在我情緒動盪、思想危疑時期的一個偶然。對於出版於一九七八年的這冊書來說，我的閱讀確實已經遲到。當時我遠離學界將近十年，治學方法與問學態度漸呈荒疏。不過，縱然翻騰於海外政治運動的漩渦裡，我也曾經耳聞後殖民理論的崛起，只是未嘗有機會窺探究竟。一九八九年秋天，在加州柏克萊的舊書店翻閱薩依德的作品時，我就深深受到吸引。自此我便從容閱讀全書，那種在思考上產生的震盪，即使在十餘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

《東方主義》乃是以系譜學的建構方式，追溯並剖析西方殖民主義的根源及其擴張。薩依德從想像（imagination）、論述（discourse）與實踐（practice）等三方面，分別探討西方白人對東方展開周密的、有計畫的權力干涉。白人以其豐富的想像力劃分地理上東方與西方的疆界，從而以龐大論述來建構進步西方與落後東方的文化觀念。這種刻意製造出來的文化位階上的落差，正是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理論基礎。在文化實踐方面，西方殖民者不斷透過旅行書寫官方文書，調查檔案，歷史紀錄，以及私人日記等等文字，塑造東方人的形象。由這些點點滴滴所累積起來的學問，便是薩依德探索東方主義的重點所在。具體而言，東方主義最可懼之處，就在於殖民者還未採取軍事行動侵入之前，就已經對還未占領的殖民地人民、文化、歷史、風俗、記憶充滿了種種虛構的想像；而這種想像，往往是負面的；如果是正面的，必然永遠是次等於西方的。

我的知識盲點，在生命的不同階段總會出現一些突破或克服的時刻。閱讀過薩依德的系列作品之後，我對於文學的分析與詮釋，不再停留於美學探索的層面。就像我在七〇年代末所讀的米列（Katie Millet）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以及在八〇年代初期閱讀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訓誡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都不懈不止地要求我必須挖掘語言符號背後的權力結構。做為後殖民理論奠基者之一的薩依德，在知識論的啟發上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這樣的，人們會這樣看世界，無非是受到主流文化或霸權論述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別人對我們的解釋，或者我們對異己（the other）的解釋，都無可避免會投射偏頗的自我意識。薩依德的後殖民理論，乃在於重新塑造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他的理論一方面在於抗拒強勢文化的支配，一方面也在於泯除過度膨脹的自我。這種開放的態度，對於台灣文學研究誠然具有無窮的暗示。

《東方主義》一書的論點，並不全然能夠適用於台灣。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薩依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的立場純粹是從中東出發。他批判的對象，不只是以色列而已，同時也指向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的西方帝國主義。因此，薩依德筆下定義的「東方」，事實上只是以中東阿拉伯世界為中心。他的東方疆界最遠也只是到達印度而已。具體而言，他的後殖民理論乃是建基在白人的殖民主義與巴勒斯坦獨立運動之間的衝突歷史之上。在援引薩依德的詮釋觀點時，就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理論所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

台灣社會穿越過的殖民歷史，並不涵蓋在《東方主義》書中。在台灣的反殖民支配過程中，西方殖民主義（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確實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不過，在討論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時，殖民經驗並不是來自西方的殖民主義，而是來自東方的日本。這種特殊的歷史現實，絕對不是薩依德能夠理解。事實上，全球的后殖民論述日益成為顯學之際，台灣近代的殖民經驗恰巧沒有與西方白人世界掛鉤，因此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並不出現在國際學術的焦點之內。如果受到討論，台灣也只是擦身而過的一個名詞。正是受到這樣的邊緣化，台灣文學的研究就更加能彰顯其嚴肅的意義。

嚴肅的意義乃在於台灣經驗在全球的殖民史中所具備的特殊性與差異性，絕對不能以第三世界的普遍經驗來概況。在第三世界蔓延的英國風（Anglophone）與法國風（Francophone）作家不斷受到討論時，存在於台灣殖民史上的東洋風作家卻是國際學界中的失語族群。從而，台灣殖民史的受害經驗也未能找到恰當的發言位置。構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當然非常複雜，而要釐清這些複雜的問題，可能需要一些嘗試。

台灣後殖民研究的遲到

後殖民研究在台灣起步，可謂相當遲晚。這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先就國內的條件來說，台灣文學的研究是在解嚴之後才正式開展的。戒嚴體制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殖民體制。它對台灣歷史、文學、語言、文化等刻意壓制與扭曲，造成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停留於缺席狀態。對台灣文學研究的禁錮，也是透過《東方主義》書中所描繪的西方白人殖民策略那樣，亦即以想像、論述、實踐三方面進行有計畫的權力干涉。當教育權掌控在戒嚴者的手上時，他們以想像的方式，認為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是沒有兩樣的。不僅如此，當權者認為，台灣歷史經驗的格局過於狹小窄化，遂逕自以中國的歷史經驗來取代台灣的這種混亂的教育方式，終於使台灣歷史淹沒在龐大的中國論述之中。

中國論述對台灣文化主體的傷害，毫不遜於戰前的日本殖民論述。今日仍然蔓延於台灣的省籍問題與統獨爭議，便是這種歷史傷害的殘餘。台灣文學研究的遲到，以致後殖民研究的跟著遲到，並非是島上知識分子欠缺歷史反省，而是因為戰後的再殖民體制阻礙、限制、鄙夷這樣的反省。戰後戒嚴文化與戰前殖民文化之間的共犯關係，由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最為明顯不過了。

再從國外的條件來看，自八〇年代北京改善與華府的外交關係以降，台灣文學史書寫已經形成中國對台政策的重要一環。他們的文化攻勢，顯然與曾經支配台灣作家的官方文藝政策有很大不同。戒嚴時期的當權者，採取高壓方式破壞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而現階段中國的文化政策則是殫思極慮重新建構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在這一破一立之間，縱然雙方的當權者策略儘管不同，但是東方

主義式的權力支配卻毫無二致。中國以同樣的歷史想像方式來建構台灣文學。其中最為重要的論點，便是堅持中國與台灣在近百年來都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上應該是互通的。以這種解釋為基礎，中國大量支持各種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企圖形成無可抵擋的論述。

中國近代史，無非是一部充滿血淚的帝國主義侵略史。猶似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乃是一部受損害、受侮辱的殖民統治史。不過，中國的文化策略似乎有意在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之間劃上等號。這種混淆的歷史解釋，達到了創造性模糊的效果，然而卻禁不起檢驗。帝國主義，以嚴格定義來說，乃是強權使用軍事侵略方式，迫使弱國必須接受不平等條約，必須開放門戶接受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與掠奪。在政治上、經濟上，弱國無法維護獨立自主的身分。然而，在文化上，弱國就不必然完全喪失其主體性。相形之下，殖民主義帶來的傷害較諸帝國主義還嚴重，因為，強權者不僅在借來的空間進行直接的政治、經濟支配，並且在文化上展開抽樑換柱的工作，終至使殖民地人民喪失其固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

比較帝國主義下的中國與殖民主義下的台灣，就可發現雙方在政經結構與文化性格方面已產生極大的歧異。中國受到資本主義的侵蝕，大部分集中於沿海地區的城市，但是整個廣大的農村腹地並未受到多少動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可能培育了不少代理人，卻未直接在中國本部建立永久文化的政權。中國知識分子強烈感受到國家的危機，不過，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語言使用卻絲毫不必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殖民地台灣的政經發展則全然不同，而文化主體的喪失更是較諸中國還更不堪設想。台灣總督府的設立，周密而徹底掌控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全部內容。台灣島上幅員極小，並不存在類似中國的農村腹地，因此就完全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的深刻滲透。自三〇年代以後，日語思考

逐漸成為台灣知識分子的書寫依據。包括最具左翼批判精神的作家楊逵、王白淵、張文環、吳坤煌、蘇維熊、呂赫若、吳新榮、郭水潭等人，都已承認不使用日語便不足以表達他們的文學思考。右翼現代主義作家如巫永福、翁鬧，以及風車詩社的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等，又何嘗不是需要訴諸日文才能進行文學創作。相形之下，中國三〇年代作家並沒有被迫使用帝國主義者的語言來從事文學想像的工作。殖民主義對於文化主體所構成的傷害，由此可以證明較諸帝國主義還來得深刻。

迂迴討論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分野，主要在於指出強勢的中國論述長期蒙蔽並阻撓台灣の後殖民視野。中國透過國際上有利而有力的發言位置，使許多後殖民研究者，無法分辨台灣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經驗有何不同。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絕對是屬於第三世界的文學。台灣作家在語言思考與國族認同上的混亂，乃是不折不扣第三世界文學的主要特色。中國社會並沒有這種現象，即使以最寬鬆的定義來看，中國文學並不能劃入第三世界的範疇。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未曾喪失過歷史記憶與歷史發言權。中國文學的傳統，也從未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發生過斷裂。甚至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方面，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曾受到嚴厲的政治挑戰。當其文化主體仍然保持得極為完整時，中國自然就不符合第三世界文化的規格。

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以降，中國自封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聯合國，在任何國際場合，北京自命為亞非拉的人民仗義直言。恰恰就是占據了這種發言的位置，遂使許多國際學者誤認中國的歷史經驗乃是第三世界文化的重要一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便是持這種看法的代表之一。中國利用這種政治上的優勢，遂企圖以強勢的中國論述收編台灣的歷史經驗。這種政治基調，正是日